

韩国现代史

「韩」姜万吉 著

陈文寿

金英姬

金学贤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韩国现代史

[韩国] 姜万吉 著

陈文寿 金英姬 金学贤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강 만 길

고쳐 쓴 한국현대사

(주)창작과비평사 1994년

根据韩国(株)创作与批评社1994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7-0205号

韩国现代史

(韩)姜万吉 著

陈文寿 金英姬 金学贤 译

责任编辑：程晓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3.25印张 336千字

印数 0001-1500

1997年6月第一版 1997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901-X/K·122 定价:1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现代史/(韩)姜万吉著;陈文寿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6

ISBN 7-80050-901-X

I.韩… II.①姜… ②陈… III.韩国-历史-现代 IV.
K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802 号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大字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译者的话

我国是最早记载和研究朝鲜半岛的国家，诸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的“东夷传”、“朝鲜传”等至今依然是研究朝鲜半岛古代史的最珍贵资料。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近30年来，我国对于朝鲜半岛这块真正与我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地区，对于朝鲜民族（韩国称为韩民族）这个与我们关系久远、近代历史命运又极其相似的民族的研究却大大地落后了。这与中朝悠久的历史关系和中韩目前急速发展的交流显然是极不相称的。随着中韩建交，所谓“韩国学”异军突起，成为社会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方兴未艾的“热门”之一，介绍性或研究性的著述也出版了不少。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然而，现在的“韩国学”还存在着一些并非科学的倾向，个别急功近利的著述甚至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而在朝鲜半岛尚处于分裂状态的形势下以韩国作为涵盖整个朝鲜半岛之正统的观点更是值得商榷。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介绍姜万吉先生这部《韩国现代史》，即使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角度来看，也是颇有裨益的。

姜万吉先生是韩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韩国历史学者。他的另一部著作《韩国近代史》已于1993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是最早介绍到我国的韩国较有影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之一。姜先生1933年10月生于韩国的马山。1959年在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毕业，后入高丽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专攻近、现代史，1975年从高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长期执教于高丽大学，1967—1980年任史学科助教、副教授、教授，1975年任韩国史研究会代表干事，1979年任高丽大学博物馆馆长。1980年因

反对军事独裁政权被解职。1984年复职，后任高丽大学史学科教授、中央图书馆馆长、月刊《社会评论》发行人等职。现为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科教授。著述除本书及其姐妹篇《韩国近代史》外，主要还有《朝鲜后期商业资本的发达》、《朝鲜时代工商业史研究》、《分裂时代的历史认识》、《韩国民族运动史论》、《日帝时代贫民生活史研究》等。曾获得韩国享有盛名的“心山学术奖”。

本书采用分类史的方法，以夹叙夹议的方式阐述20世纪前期的殖民地时代史及后期的韩国史，运用比较丰富的资料从殖民地时代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政策，包括殖民地经济和社会文化政策，谈到朝鲜民族可歌可泣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文化运动；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国家的建立，谈到南方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特别是争取民族统一和民主化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等。作者参考了相当多的书，特别是比较充分地利用了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之该时代的历史是作者研究并讲授20余年的专长，因此本书堪称是学术价值和作者个人特色两者兼具的著作，书中的许多资料对于研究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特别是当代韩国史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由于我们对朝鲜半岛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本书不敢妄加过多的评论，相信读者自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此，仅就阅读、翻译本书的体会和感想再奢谈几句。

首先，作者能够摆脱韩国学术界盛行的“南韩中心论”观点，以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阐述20世纪朝鲜半岛的历史，特别是作者认为韩国“部分人企图以南韩史作为‘八·一五’后我国历史的中心，把北韩史当成附加部分，或者企图分别写成南韩史和北韩史，后合编成册……这两种做法都有些欠妥”，并且进一步认为“将‘八·一五’之后我国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的南北的历史也难于定名为‘韩国’现代史”。作为一个韩国学者而具有如此观点，是弥足珍贵的。或许这也应该引起部分盲目地视韩国为正统、以“韩国”界定朝鲜半岛历史和文化的学者的深思。

其次，作者能够摆脱偏见，比较认真地研究资料，提出一些值得赞许的客观的观点。例如，朝鲜共产主义运动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朝鲜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此，作者给予了客观的论述和积极的肯定。这在反共氛围依然颇为浓重的韩国无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充分反映了作者作为历史学家的严谨学风。再如，对于现代韩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朴正熙时代，作者在肯定其经济成长和现代化的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和严重性。这种观点固然与热衷于赞扬、推销所谓“汉江奇迹”的韩国政府和学者（甚至包括我国的部分学者）相违，但联想到最近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和三星、大宇等集团董事长被起诉、判刑，以及前两年汉江圣水大桥、汉城三丰百货大楼塌陷等耸人听闻的事件，确实令人掩卷深思。

再次，作者采用分类史的方法，对殖民地时代史和当代韩国史的诸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和论述，使本书作为一部现、当代历史著作在体例上具有鲜明“史论”的特色。我国学者在研究外国史时，除少数进行深入的个案性质的研究外，大部分著述采用编年体，流于政治、外交史的叙述，特别是有些现、当代史著述更成为大事编年或大事记。或许我们可以从本书的体例中得点启发。

当然，正如作者在阐述朝鲜半岛的分裂过程中所提到的，朝鲜半岛在地理政治学上处于比较特别的地位，即处于大国的夹缝，因此，近、现代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是与世界史，特别是东亚史和东亚、太平洋国际关系史密不可分的。但是，这个问题在本书中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或许是韩国过份强调其历史主体性发展的倾向使然？！如果说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外关系，包括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时需要摆脱历史的和现实的大国优越感的话，那么韩国学者在涉及类似研究时显然需要摆脱某种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造成的狭隘性。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称我国东北为“满洲”、延边地区为“间岛”、俄罗斯远东地区为“沿海州”，有些是历史固有名词，有些是韩国（和日本）约定俗成的用语，因此基本上予以保留，必要时加了译注。由此联想到一个翻译上的技术问题，这就是朝鲜语（韩国语）和日语中汉字词的汉译问题。至今在这个问题上，大都采用不无取巧色彩的“拿来主义”，而且应该承认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固然是相同的汉字，但有些字的用法和意义显然已有不同。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也是“拿来主义”，但同时也力求更多地采用现代汉语及我国通行的用法，如“劳动组合”译为“工会”、“共同声明”译为“联合声明”、“民主守护”译为“捍卫民主”、“韩半岛”译为“朝鲜半岛”等。是否恰当，还请方家予以指正。

姜万吉先生慨然同意翻译本书并欣然为中文版作序，对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人名、地名的汉译问题给予了悉心的指点，从而使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翻译过程中，杨通方教授自始至终给予了热情的鞭策和鼓励。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将本书列为“韩国学丛书”之一，给予出版资助。在此，对于他们所给予的热心指导和大力帮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本书前期翻译工作主要是由金英姬女士和金学贤先生进行的，如果没有他们打下的良好基础，翻译工作是难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谬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陈 文 寿

1996年8月28日于北京大学

中文版序

继《韩国近代史》被翻译出版后，《韩国现代史》又被翻译出版，对此我深感兴奋。在韩国，一般将1945年解放以后作为现代史。但由于编辑上的缘故等原因，本书则以20世纪前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时代及后期的民族分裂时代作为对象。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现将本书所叙述的内容加以概述，以此作为发行辞。

殖民地时代和民族分裂时代对韩民族而言是苦难的时代。在何种程度上客观地再现这一苦难的时代史，是该时代史专攻者最大的课题。本书的殖民地时代史部分，首先试图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政策，从整体的角度对其所具有的性质，从具体的角度对其推进的方式进行毫无夸张的概述。在近代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理应落地生根的重要时期，朝鲜人却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为反抗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分裂为左右翼阵线，加之由于中国东北三省被日本所占领，民族解放运动战线被相互隔离。即使是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为克服分裂和隔离状态并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也依然前仆后继地进行着。本书以史实为中心叙述了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左右翼统一战线运动与解放初的统一民族国家建立运动、60年代以后的民族统一运动是相互联系的。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代的经济体制，一言以蔽之，是掠夺经济体制。这35年是民族资本理应获得积累的重要时期，但实际上所展开的却是掠夺一边倒的历史过程。尽管建造了若干的近代经济设施，但这些只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绝非朝鲜

人主体的经济设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时代，日本对朝鲜民族文化的抹杀政策之残酷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悠久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仍然足以制胜于它。对这个问题加以概述并将其传达给读者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解放后分裂时代的历史只是叙述了南韩的历史。首先叙述了民族分裂逐渐深化的过程。从分裂国家的建立，经李承晚政权的独裁化、“六·二五”战争、张勉政权，到朴正熙政权以至于卢泰愚政权的军事独裁政权，它们逐渐强化了分裂国家体制。本书试图对这个强化过程加以概述。接着，叙述了在独裁政权强化分裂体制过程中从未间断的和平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发展过程。殖民地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分裂时代的民族统一运动在韩民族近、现代民族运动史上一脉相承，将来也会继续进行，直到实现统一为止。

分裂时代的经济史也只限于叙述南韩经济。首先阐述了对殖民地时代的经济遗制的处理问题，接着叙述各分裂体制政权的经济政策的展开过程。虽然很多人从成功的角度对朴正熙政权的经济建设进行了评价，但我认为忽视其所导致的副作用的深刻性也是不对的。更何况这种成功并非朴正熙及几个经济官僚的功劳，更非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时代所建设的若干资本主义设施的结果。我想，这是全体韩民族从近代以前即已具有的文化经济潜力经过殖民地时代的萎缩和屈折，在“六·二五”战争后的建设过程中名副其实地迸发而出的结果。

虽然在朴正熙及其后的军事政权时期，确实在经济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在政治、社会、文化上却造成了许多副作用。在这个时期，南韩的民众为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副作用，推进整个历史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各种的努力，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历史最终是不能以局部的成功来评价全体的，我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部门应该均衡地发展。本书从这种观点出发，以教育活动、工人运动、文化运动等为中心阐述了分裂时代的社会和

文化。

相互隔绝已久的韩国与中国建交不过几年，人员和经济的交流即已急速扩大。从 1989 年至今，我已经六次访问中国。我想，为了韩中关系的均衡发展，现在该是确确实实地进行不亚于经济交流的文化交流的时候了。如果拙著《韩国近代史》和《韩国现代史》的中文版对于韩中文化交流能够有所裨益，我将倍感欣喜。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中国读者加深对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关心，希望韩中友好进一步发展下去。

姜 万 吉

1996 年 8 月 23 日于汉城

修 订 版 序

如今回想起来，1984年初版《韩国近代史》和《韩国现代史》的撰写是从1981年开始的。当时朴正熙政权因“十·二六”事变而垮台，以全斗焕、卢泰愚等为首的所谓“新军部”通过“一二·一二”事变、“五·一七”扩大戒严、镇压光州民众抗争等掌握政权，以所谓“肃正”之名对社会各方面的民主势力横行暴政。我也深受暴政之害，被赶下大学讲坛而沦为失业者。

虽然下定决心利用“谪居”期间将讲授了近20年的我国近现代史撰写成书并着笔写作，但却连大学图书馆都无法利用，在这种恶劣条件下著书的艰辛至今记忆犹新。初稿完成的1984年又遭到一次打击，但书终得出版且得到意外反响，撰写时的困难也就渐渐地忘却了。

即使是在军部的暴政之下，民族民主运动仍然如火如荼地继续着。到80年代后期，阴霾终于慢慢消散，民主主义出现了缕缕的曙光。民主主义的进展给学术界，特别是我国近现代史研究，带来了划时代的良好成果。

例如，《韩国现代史》谨小慎微地叙述日本殖民地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只是限于其20年代的活动。即使如此，这还是当时概说类和时代史类著作中的初次尝试。那时撰写概说类或时代史的历史学者，一般很少认为日本殖民地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具有这种历史认识的研究者，一般也认为如果在概说类或时代史中叙述共产主义运动，所著书稿将通不过审查而不能出版。另外，虽然20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或多或少还有研究，但30年代之后的则几乎是无人问津。

时间仅过 10 年，如今概说类或时代史类著作涉及日本殖民地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已成司空见惯之事。不仅如此，关于 30 年代之后的革命工农运动、共产党重建运动、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和祖国光复会的活动、统一战线运动的研究也获得急速的进展。这些成果大部分是 30 多岁的青年研究者完成的，甚至于可以说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进步的历史学界”。这种变化和成果着实令人惊讶。

再如，《韩国现代史》视推进统一民族国家建立运动的建国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左右合作运动和 1948 年南北联席会议为“八·一五空白时期”民族运动史潮流的中心，按照这种思路进行论述。仅仅如此，朋友同事即担心招致政府当局和极右势力的迫害，而予以善意的劝阻。而 10 年后的今天，不仅按照这种思路撰写统一民族国家建立运动的学位论文已然出现，这些运动在我国现代史上占有理直气壮的地位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这种思路还反而被批评为“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恍如隔世。

于是，我既认为我国的近现代史应该根据这种变化而改写，且又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于《韩国近代史》和《韩国现代史》作为历史著作在黑暗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再者又感到吸收 80 年代之后丰富的研究成果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此曾经想放弃出版修订版。

然而，我又觉得，以 80 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认识为基础而撰写的《韩国近代史》和《韩国现代史》的方法不仅还有生命力，而且当时堪称为特殊性观点的如今已成为普遍性观点。特别是随着 80 年代后期世界史和民族史的变化，撰写《韩国近代史》和《韩国现代史》时所确立的关于我国近现代史的观点和方向反而更受重视。最后决定边消化 80 年代之后的研究成果，边进行修订工作。

修订版《韩国近代史》，特别是门户开放前后的社会经济史部分，不仅吸收了近 10 年南韩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吸收了

此前难于利用的北韩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修订版《韩国现代史》特别着力强调 30 年代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史，全面进行改写；“八·一五”之后的历史则增加了统一民族国家建立运动以及 80 年代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部分。

与撰写《韩国现代史》时相比，现在将“北韩史”写进我国现代史的内外学术条件，实际上已略有改进。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把“北韩史”收入修订版，而只是叙述“南韩史”。因为现在部分人或者企图以南韩史作为“八·一五”之后我国历史的中心，把北韩史当成附加部分；或者企图分别写成南韩史和北韩史，然后合编成册。我想这两种做法都有些欠妥。

我认为应该认识到“八·一五”之后南北两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各具其固有的历史性，并且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将南北“八·一五”之后的历史融为一个而不是两个历史，给予其对等的位置和同样的分量。但是，学术界内外似乎还不具备如此撰述的条件。另外，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根据这种历史认识，将“八·一五”之后我国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的南北的历史也难于定名为“韩国”现代史。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问题需要说明，这就是书中所出现的中国和日本的固有名词的标记问题。原则上任何国家的固有名词都应该采用其读音标记，这种做法是大势所趋。但是，对于汉语我们已经熟谙于其汉字谚训，查找原音并非举手之劳，因此除必要时在括号注明原音外，均采用汉字谚训。至于日语，特别是训读，因只是运用日语标记汉字，故完全采用其原音；而音读，大部分采用原音标记，部分与我国的汉字谚训标记混用。尽管明知这乃是取巧的办法，却只能这样做，还请读者谅解其中的苦衷。

撰写初版时只是有限的几个人提供了帮助。相比之下，这次修订工作则几乎是高丽大学韩国近现代史博士课程的专业人员总动员，给予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修订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此外，在撰写 80 年代的教育、工人运动和文化部分时，还分

别得到金容逸、丁怡焕和辛斗远的帮助。尽管众人给予了帮助，但错误及不足之处则完全是著者的责任。最后再次对帮助修订工作的诸位以及创作与批评社的丁海廉、高世铉表示感谢。

姜 万 吉

1994 年 1 月 9 日

初 版 前 言

继阐述门户开放前朝鲜王朝后期和开化时期历史的《韩国近代史》出版之后，论述日本殖民地时代和解放后分裂时代的《韩国现代史》现在也问世了。

本书的体例和宗旨与《韩国近代史》相同。论述体例是采用分类史的方法，将日本殖民地时代史划分为：殖民地统治政策的实施过程；反抗殖民地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殖民地经济政策的展开过程；殖民地社会文化政策及对应的民族文化运动等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解放后的分裂时代乃是民族史的悲剧部分，也是划分为：分裂体制的确定过程；为克服分裂体制，实现民族统一而奋斗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展开过程；清算殖民地经济体制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过程及其弱点；分裂时代的社会文化体制及其局限性等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在历史叙述上回避编年体而采用分类史方法，目的不仅在于减少以政治、外交为中心撰写历史的弊端，特别地还在于认真地重新思考选择以怎样的事实作为“历史”撰写史书这个问题。

虽然关于日本殖民地时代历史的研究在独立运动史领域里获得某种程度的进展，但尚未体系化；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能够编著通史和时代史的阶段。因此，将日本殖民地时代史撰写成一般知识分子能够轻松阅读的书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关于殖民地时代的概说类专著现在该出版了。

解放后的分裂时代占据本书的一半。作为历史著作而言，论述所占比例似乎还不是很大。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领域的研究

成果寥寥无几，主要只能依靠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我国的历史学不仅没有积极地进行同时代史的研究，而且也没有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综合整理。在这种不成熟的条件下，把解放后的分裂时代作为历史的时代概说化或时代史化绝非易事。然而，在殖民地时代，民族史学者朴殷植将自己的时代史整理成《韩国痛史》和《韩国独立运动血史》。由此可知，分裂时代的历史学显然是在回避责无旁贷的同时代史的研究和论述。

当代历史学要把作为同时代的分裂时代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对象，最重要的理由在于这类研究和论述具备为克服分裂而做出贡献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明知如此，本书却只叙述了分裂时代的历史，而对分裂体制却没有深入的探究，笔者深感羞愧。虽然某种程度上尽量努力做到不回避分裂现实，不埋没于分裂体制，但这并不能减少作者的愧疚。

《韩国近代史》和《韩国现代史》两书并非本意之作，是作者在被赶下讲坛的烦闷时期里写就的。这种时期目前仍在继续。虽然作为无法回避历史现实的一个研究者，全然不知自己究竟有多大能力客观地叙述历史，但到即将脱稿的今天还依然深悔当初没有写得更好。

与《韩国近代史》相同，参考文献只列举撰写时直接参考的文献。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采用分类史的论述方法，内容多少难免重复。特别是作为历史著作来说，经济部分统计表过多；没有消化近代经济的理论；尽管想方设法而仍无法利用原始资料，故虽知统计数字有误却又沿用等。我将在今后改正这些不足之处。

本书的出版因作者的缘故而延宕了一年多。最后再次向创作与批评社表示感谢。

姜 万 吉

1984 年 5 月 7 日

— 13 —